

A7 卞之琳的情诗,许多我都喜欢,尤以《鱼化石》给我的震撼最大,特别是末句,“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”,很苦涩,很深情。
——香港作家系列5:王良和

A8 忽然发现,四十五年父子了,我居然并不了解他。
——董改正《还原父亲》

A9 如果,你想和孩子一起做出一无二二的玩具,或者仅是想找回童年的快乐,不妨看看这本畅销日本30余年,销量超过百万册的手作玩具完全指南。
——刘聪《在DIY玩具中找回童年乐趣》

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系列专访之二

往低去要穿越大千世界,向高走要抵达辽远星空——这也是典型的摩羯座心态: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无路可走——

徐则臣:永远带着问题意识去写作

□文/羊城晚报记者 吕楠芳



《北上》虚构了一个1901年沿着大运河北上寻找弟弟的意大利人,这名意大利人在途中与随行翻译、水手、脚夫等人建立了紧密的情谊,在抵达大河尽头时,他却不幸离世,但他的弟弟、中国朋友以及他们的后人,却与他北上的这条大运河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小说阔大开展,气韵沉雄,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,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“秘史”,书写出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。

徐则臣,197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,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现为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副主编。著有《耶路撒冷》《王城如海》《北上》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《青云谷童话》等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、冯牧文学奖、2019年花地文学奖、年度新锐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、年度小说家奖等,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十余种语言。2019年8月16日,《北上》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

8月16日上午,徐则臣正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小餐厅里,为他的新书《从一个蛋开始》接受媒体专访,中途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来,一个个电话轰炸而至,他没有接听,手机放到一边,坚持和在场记者做完访谈。
接下来的几天,回到北京,他以杂志副主编的身份,跟完《人民文学》的三校,看蓝本、签字下厂印刷。几天里几乎婉拒了所有采访。接着他躲到甘肃山里,一消失就是一个多星期。
等到羊城晚报记者终于约上徐则臣采访时,茅奖新闻的热度过去了。不过,对于读者来说,阅读茅奖作品,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为晚。在中国人的必读文学书单中,邂逅徐则臣,也是迟早的事。
摩羯座的徐则臣,以文坛劳模的姿态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学领域的开辟。在他身上,摩羯座的许多特点“暴露无遗”:有耐心,肯吃苦,也很固执,不达目的不罢休。他把自己形容成一个“问题青年”,永远带着问题意识去写作,而他的问题之绵密之宏大,往低去要穿越大千世界,向高走要抵达辽远星空——这也是典型的摩羯座心态: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无路可走。徐则臣做到了。

谈茅奖 没有鲜花和掌声这活儿也得继续干

羊城晚报:获奖后这段时间您是怎么度过的?是不是一个又一个采访连着来?
徐则臣:没你想象的那么热闹。评奖结果出来后,我就去甘南和天水采风了,很多采访邀请基本都婉拒了。其实没有一劳永逸的,没庆祝也没仪式,家人朋友高兴一下就行了。作品是公共的,生活还是我自己的,接下来该怎么忙还是怎么忙,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变化。我看待自己的写作,依靠的不是一个又一个奖,而是一部又一部作品。都是老运动员了,都知道写作到底是怎么回事,有鲜花和掌声固然很好,没有,这活儿也得继续干。
羊城晚报:大家提起徐则臣,总会给您贴上“70后”作家、新锐作家、青年作家的标签,您自己对这些标签怎么看?
徐则臣:标签也好,命名也好,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,方便评价和界定,把你放到某一个可以言说的范畴里。我对这个没有任何的不适。评说由人。说是“70后”作家、

谈“70后”作家群 五年或十年后气象一定蔚为大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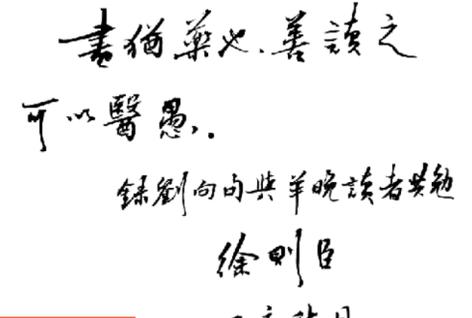
羊城晚报:您认为“70后”作家被低估了吗?
徐则臣:我没有觉得被低估或高估,我只是认为应该正视这一代人的写作,要对他们抱有希望和信心。“70后”作家总体上有一个特点,长篇写得少,进入长篇小说相对比较晚,很多实践都花费在中短篇小说上。“70后”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都非常好,我们是伴随着期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,期刊对我们的培养和训练大部分也是在中短篇小说上。但现在判断一个人和一一代人的写作成就,习惯上拿长篇小说做标准。我相信在五年或者十年后,等优秀的“70后”作家都能写出自己成熟的长篇小说了,那气象一定蔚为大观。
羊城晚报:同时代的作家在写作上是否存在共通性?您反感那种捆绑式的、针对某个群体的评价吗?
徐则臣:共性肯定是有的。很多人不愿意使用代际的说法,认为这样会窄化了我们的写作,甚至觉得这是一种鼠目寸光,短视。长远来看,文学史上的10年、20年,代际的确没什么意义。比如我们现在看李白和杜甫的写作,完全可以大而化之地认为他们代表了唐诗的巅峰,根本不会去考究他们的年龄差,但如果具体分析他们的作品你会发现,安史之乱对杜甫的影响非常大,但对李白影响不大,这就导致了他们的作品内容和风格有着巨大的差别。对作家来说,时代对他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,没有一个作家能够逃脱时代的烙印一清二楚。对代际这个问题,也许我们可以平常心地去看待它的合理性。“70后”作家的共通性,可以交给学者、批评家,交给时间和文学史去梳理。

谈写作 问题意识是我个人写作的初衷

羊城晚报: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?
徐则臣:高二开始写第一篇小说,高三开始写诗,但是那时还没想过要成为一名作家。真正想当作家,是在大一暑假,突然觉得作家是个神奇的职业,写作对我的诱惑很大。
羊城晚报:您参加工作两年后考入北大中文系读研,是为了专业学习写作吗?
徐则臣:去北大之前我已经写了好几年了,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写作。北大对我的影响很大,一是我的导师曹文轩先生,他对我言传身教,让我受益终生;另一个就是北大的学术环境,让我有了一个比较扎实的文学史背景,在北大接受的系统的思维和学术训练,对我后来的写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羊城晚报:有人将你归类为“学院派”作家,您认同吗?
徐则臣:之所以有这种命名,可能是因为作品中思辨性和问题意识相对突出。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写,没想过过去写什么派。问题意识确实是我个人写作的初衷,如果没有问题,我不会去写东西,不管最后能否解决某个问题,它的确是我写作的动力所在。

谈《北上》 我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

羊城晚报:《北上》面对的是什么困惑?
徐则臣:写《北上》,首先是因为我和水的情感联结。京杭大运河在我生活中意义重大,我自以为对它很熟悉,但事实上非常吊诡,你对一个东西越熟悉,你对它的困惑就越大:你会有从整体上探究它的冲动,不仅关注它的现在,还会对它的过去和将来保有兴趣。一旦要写的想法出现,问题就来了。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条河,它仅仅是一条河吗?它有哪些巨大的作用?在过去、在今天、在未来,它的作用以及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它的态度有哪些差异?这条河既是流淌在大地上的,也是流淌在纸上、书中,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。我想从文化的意义上重新打量这条河。
羊城晚报:《北上》是不是您最满意的一部作品?
徐则臣:手心手背都是肉,我不会厚此薄彼,也难以如此区分。但我可以说,它是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作品,也是我对世界、对历史、对现实图整体性把握的一个最新的呈现。小说写得比较艰难,你无法在既有的作品中找到可资借鉴的方法论,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移植过来,尤其小说的结构,如何处理辽阔的时间和空间跨度,花了我很长时间去推敲。



谈文学 面对文学式微不必哀嚎

羊城晚报:写了22年了,您会对写作的意义产生焦虑吗?
徐则臣:焦虑就像一条狗,一直跟着我。理论上我当然知道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在哪里,但当你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时,你又常会不由自主地去怀疑它。《北上》刚写完,有一阵子我一直陷在自我怀疑里,整个人有种被掏空的悲伤和惆怅。有天晚上,我在散步时听纪录片《再说长江》的音频,片头里有一颗水珠滴落的声音,那声音饱满、明净、硬朗,闪着张艺谋镜头中高分辨率的清晰的光,你都想象得出那水珠晶莹剔透的模样。接着是另外一个声音,一个小姑娘在长江边伴着涛声奔跑,一边跑一边奶声奶气咯咯地笑,笑声清新、干净,散发出青草、溪水与阳光的气息。我眼泪哗一下就出来了。这两个细节让我备受感动,我觉得听这个节目值了。当时我就想,如果别人看《北上》,也能在浩浩三十万字中被某个细节如此这般地感动,我这四年也值了。
羊城晚报:对文学呢?关注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徐则臣:这个我倒没那么焦虑。时代的发展不会永远按照我们过去制定的标准和趣味在运行。时代变了,作为持有既定审美规范和标准的一帮人,我们可以做出自己挽救的努力,也希望我们的标准寿命更长一些,但如果它果真不可逆转,那就要正视,不必抱残守缺,更不能硬操着一把尺寸确定的游标卡尺去衡量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。与时俱进,有时必须接受新东西。“破”的过程的确很痛苦,只哀嚎没有用,要转变思路,开动脑筋去探索围绕新的时代标准“立”的可能性。我也不觉得14亿人每人每天都捧着《红楼梦》,就是世界上最好最正常的生活。
羊城晚报:所以您也没有读者焦虑吗?不关心作品的销量?
徐则臣:没有。我希望书出来有人喜欢看,但我不会为了销量去改变自己的写作。你跟着某种可能畅销的时髦趣味走,迟早会被时髦带走,因为时髦和趣味本身就在变,你不可能永远都能迅速地跟得上。写作本身就是滞后的,还不如该怎么来就怎么写,我只对自己负责。不是矫情。你没法对别人负责,最好的办法就是忠实于自我表达。这个世界上,总会有人跟你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,有那么几个人的频道跟你一样,就够了。

名家 马原:我现在写得 不比年轻时差

□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



“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,我写小说。我喜欢天马行空,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。”三十多年过去,当代著名作家马原在小说《虚构》中的金句,仍然为今天的文学爱好者津津乐道。
近日,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推出了马原的藏区小说精品系列:《冈底斯的诱惑》和《拉萨河女神》,该系列收录了马原在西藏生活时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,其中《冈底斯的诱惑》收入《冈底斯的诱惑》《西海的无帆船》《山的印象》《叠纸鹤的三种方法》等八篇;《拉萨河女神》收入《虚构》《拉萨河女神》《喜马拉雅古歌》《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》等八篇。
马原如今生活在西双版纳的姑娘寨,每天和大自然打交道,他也越来越理解自然主义哲学家。近日,马原从山水之间来到了城市,在上海国际文学周和上海书展和读者朋友们见面,并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专访。
自2008年生了一场大病开始,马原的身体状态一直不大好,现在还经常手脚发麻。有医生说这是因为血压太高,也有说是因为失控了的糖尿病,出门见朋友,最大的影响是不能和在家一样吃中药。但看得出来马原还是非常高兴,他和作家朋友对话,和读者签名对话,他对羊城晚报记者说:“比我有钱的人成千上万,比我快乐的人没几个。都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,我敢说我不如意只有一二,只有一些意外的小烦恼,没有大烦恼。”

A 是上天帮忙才写出小说来

羊城晚报:《拉萨河女神》是您1984年发表的小说,35年过去了,您怎么看自己以前的作品?
马原:这次新出版的都是我写于1980年代的西藏小说,过去这么多年,我现在在感觉他写得太好了,比现在的我写得好,这些都是特别有灵感、有设计,变得不纯粹了。在80年代,小说是非常纯粹的,它来自你的生活,也是你的日常。
羊城晚报:从新出版的这两本藏区小说集里选,您个人最喜欢哪篇?
马原:《喜马拉雅古歌》,这在我的藏区小说中是完美的一篇,个人特别喜欢,还有《游神》我也很喜欢。这种小说都是上天帮忙才能写出来的。现在读起来,感觉特别亲切。由衷地说,那是在非常自由奔放的状态下完成的。现在我还有自由,但奔放不再了。30多岁时,我可以拥抱天下和世界,到了60多岁,再这么说,会让人觉得可笑。你必须承认,年轻时生理上的活力,会给你不同的精神面貌。谁也不敢说,自己60多岁就会比30多岁写得好。虽然我还是认为自己现在写得并不比年轻时差,但我知道文坛不这么看,文坛说,马原到底是老了,退步了。
羊城晚报:您的小说美学从80年代就已经奠定了。
马原:对。我更看重小说中隐形的东西,也就是海明威的冰山理论,显露在外面的冰山不过是八分之一。海明威是一种

板斧写作,他把文学枝繁叶茂的巨树用板斧修掉,只剩主干和几个主要的枝干,其他东西都不见了。我一直视海明威为第一位老师,这也是我的小说美学立场,观念一直没有变,这辈子里写的都是这种隐性小说。你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小说美学立场,就决定了处理小说素材的态度。稍微多写一点,就觉得过了。
羊城晚报:藏区对您的创作意味着什么?
马原:不单是藏区,包括我现在在西双版纳的姑娘寨,这对小说家来说是非常幸运的。到了不一样的环境,有文化差异,你会变得敏感,所有的知觉系统变得敏锐,敏锐才会有好的状态和灵感,这对作家来说是宝藏。
羊城晚报:现在回头看,您怎么看“先锋小说家”这个标签?
马原:这个标签是文学史家定的坐标,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,各种主义和我的关系都不大。先锋小说是一种主张,可能这东西和我的小说有某种天然的契合,符合某种标准,于是被史学家选中,被扣上这个帽子。
实际上,做文学史是残酷的,很多作家会被遗忘。现在老说“先锋文学五虎将”,但这个说法其实存在巨大的缺失,残雪和孙甘露都被遗忘了,但在那个年代,他们的写作绝对是独树一帜的。他们没有被列入,但不能说他们就不是先锋文学的探索者。

B 希望自己的小说300年后还有人看

羊城晚报:在2011年重新动笔写《牛鬼蛇神》之前,您停了20年没写小说,为什么?
马原:其实是写不出来。90年代初,大伙儿已经意识到小说的时代过去了。80年代小说太火,那种狂热是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,走到路上会有人要跟您合影、签名。到了90年代,大气候不再,大家不关心小说了,你还那么起劲地写,好像有点奇怪。当你不被需求的时候,写的动力自然会衰退和下降。我也曾多次尝试要写,发现写不成,只有开始没有结束,再二再三的结果就是停下来,一停就是二十年。
这二十年,我从写小说变成了讲小说。直到我生了大病,重新回到小说,这种感觉非常快乐,和讲小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小说家就像在模仿上天,在创造自己的世界,无中生有,比“有中生出”快乐很多倍。
有时我以己度人,沈从文、钱锺书也是在小说创作之后转而去研究,但之后再也没回到小说创作。如果他们能回来,或许后来就不会有《管锥编》和《中国服饰史》。

我没有回到小说创作。如果他们能回来,或许后来就不会有《管锥编》和《中国服饰史》。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小说30年之后还有人看,甚至希望300年后还有人看。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愿望,我不知道能否做到。这次出版的这两本小说,也算一种对我的测试,看看今天还有多少读者愿意接受我的小说。
羊城晚报:之前您提出要创作“形而下三部曲”,包括2013年问世的长篇《纠缠》,以及2017年出版的长篇《黄粟一家》,为什么会有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转变?
马原:以前价值相对不那么高的喜剧,今天变成了主流,悲剧反而成了笑柄。我是50后,我们这代人对传统和价值体系,有很强的自持力,这些东西不应该拿来嘲笑。我的小孩子今年十岁半,他把我一切觉得有趣的东西形容为“搞笑”,经常说的词就是“搞笑”,经常和我说:“爸爸,这个挺搞笑的。”搞笑一个词似乎可以囊括所有。

C “让孩子赢在起跑线”,这种说法坏透了

羊城晚报:这几年您给小儿子写童话,好像又从形而下转回了形而上?
马原:对,写童话让我重新回到了形而上,这个过程也非常快乐。我是为了我儿子的,因为中国的童话是高度形而下的,孩子完全可以不读。孩子的内心是浪漫天真的,我们应该去读《小王子》,去读那些优秀的世界童话。
羊城晚报:您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是什么?
马原:我现在不太鼓励小儿子读很多书,读书未必就是利大于弊。都市里长大的孩子,一点天然的状态都没了。哪怕是有益的,对孩子天然的心灵状态,都是一种戕害,是灌输和填塞。小儿子在我的城堡里长大,他每天打交道的是植物、动物、大山、自然。
我怎么教他,我现在对整个知识体系也是怀疑的,更不提培养孩子。最坏的口号是: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。让孩子套上枷锁去竞技场,这坏透了。如果一个人的寿命是一定的,晚上学一年,那么孩子就寿了一年童年,早上学就意味着早“上市”。我的孩子7岁半才上学,外面城

市的朋友带孩子来玩,一对比,好像我家孩子什么都不不会,其他孩子会钢琴、外语。我太太就有些担忧,我说那又怎么样?虽然他现在的心理年龄比城市里的同龄人要小,但他的童年更长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羊城晚报:自从生病之后,您似乎特别相信大自然的力量?
马原:因为我们原来离自然太远了。我识字很早,一生都在看书,算是我们这代人中间接知识比较多的人,但我还是发现我对这个世界所知甚少。在乡下生活几年,每天早上起来要去扫院子,扫一个来回大概要40分钟,我就想,为什么每天都有竹叶落下来?因为竹子生长速度快,昨天冒芽,明天就能长这么高,新的叶子出来,就会让老的叶子衰退,所以一定要落叶。养竹子就得不停地扫竹叶。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道理,但它不在人类认为有价值的知识体系里。可是,生活在大自然中,你会发现自然才是主宰。在山上生活了8年,我越来越理解自然主义哲学家,他们倡导保护物种,因为人类的盗剥和入侵正在慢慢毁掉大自然。